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And Its Influence – By Yung Shang Him

宋宏与苗美幼童研究丛书

创办出洋局及官学生历史

容尚谦 著

王敏若 译



出版社

宋宏与苗美幼童研究丛书

郭维强题



ISBN 7-80689-571-X



9 787806 895719 >

ISBN 7-80689-571-X/K·74

定价:196.00元 本册:15.20元

容尚谦与苗美幼童研究丛书

创办出洋局及官学生历史

■ 容尚谦 著
■ 王敏若 译

珠海出版社

编纂委员会

主 任：王广泉

副主任：黄晓东 邓群芳

编 委：王广泉 黄晓东 邓群芳

蒋建成 刘福祥 高德民

古锦其 黄河清 杨 穆

高宗鲁 吕唯唯

主 编：黄晓东

副主编：蒋建成 刘福祥 古锦其

黄河清 杨 穆





年青时期的容尚谦



老年时期的容尚谦



年青时期的余学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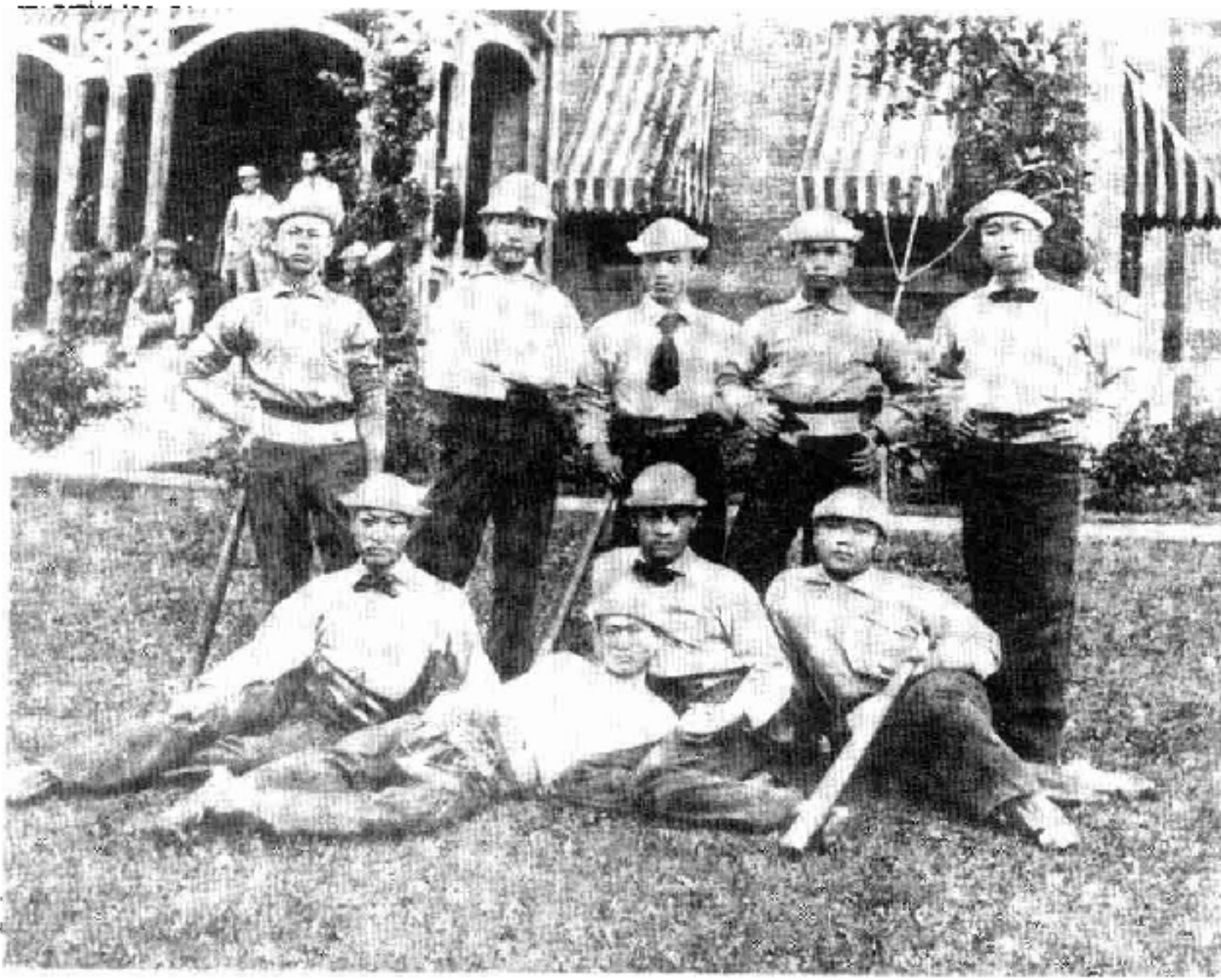
老年时期的余学玲



容 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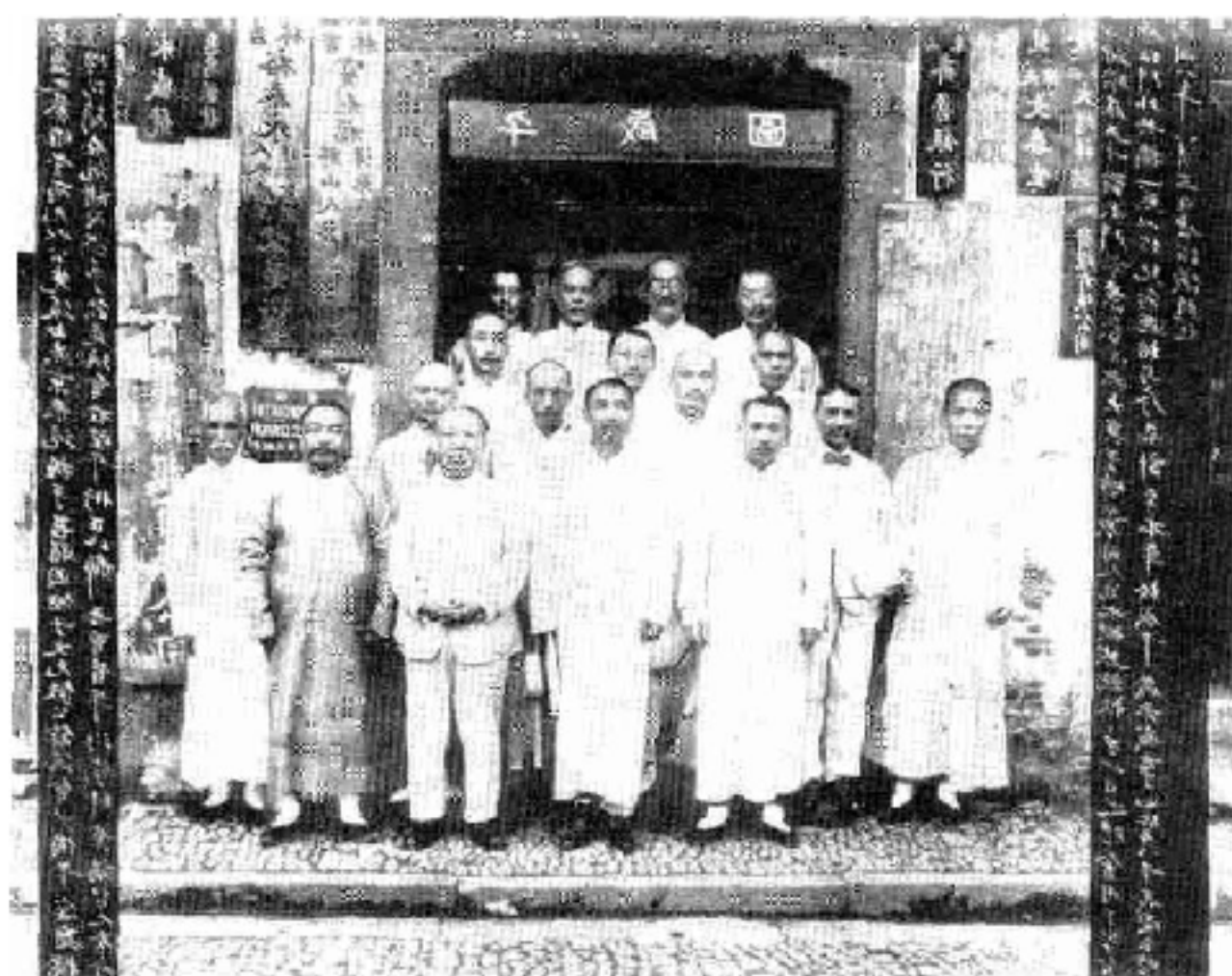
黄 寬



留美幼童“东方人棒球队”（背景是“鬼屋”）
 后排左起：蔡绍基、钟进成、吴仲贤、詹天佑、黄开甲
 前排左起：陈钜镛、梁敦彦、邝咏钟、李桂攀



部分留美幼童1905年在天津道台衙门留影，梁敦彦任道台
 后排左起：周长龄、曹家祥、容尚谦、唐绍仪、梁敦彦、王良
 登、蔡廷干
 前排左起：蔡绍基、方伯梁、刘家照、杨昌龄、卢祖华、沈嘉
 树、梁如浩



部分留美幼童回母校留影

背景是拆毀前上海山东路“大清幼童出洋肄業局”出洋預備學校原址。17人的年齡相加正好1000歲，故名“千歲圖”。

前排：沈德耀、鍾文耀、陸德章、羅國瑞、陶廷賡

唐元湛、丁崇吉、吳煥榮、吳其藻

中排：程大器、蔡廷干、朱寶奎、吳應科

后排：周萬鵬、唐紹儀、容尚謙、黃耀昌



部分回國的留美幼童1935年于上海合影

前排左起：丁崇吉、周長齡、蘇銳剗

后排左起：容尚謙、陶廷賡、卞炳光、鍾文耀

部分回國的留美幼童1936年于上海合影

前排左起：鍾文耀、溫秉忠、丁崇吉、唐紹儀、
周長齡、吳仲賢

后排左起：周傳謙、容尚謙、卞炳光、蘇銳剗、
陶廷賡





张 磊

珠海历史文化书系——“珠海历史名人”丛书、“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丛书、“珠海历史名人著作”丛书、“珠海人文风物”丛书等四套丛书的付梓，是珠海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这套书系对传承珠海历史文化，开发珠海历史名人资源，提升珠海城市文化品位，必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毫无疑问，文化实力是构成区域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有机部分。人类文明的发展，包括经济社会的演进，人文素质的提高，都有赖于先进文化的导引、支撑和推动，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传统则为其重要任务。民族虚无主义是错误和有害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正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根基。

珠海人文历史源远流长，拥有 6000 余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史，自古以来便是岭南文化重镇之一。迄至近世，因与澳门陆地相连，与香港隔海相望，区位优势凸现。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珠海在与外来文化的长期交流、碰撞、融合过程中形成了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精神品格，对外来的新鲜事物敢于、善于和敏于接受，因而在近现代历史的大变局中，珠海人比其他地区的人更早、更全面、更深刻地接触和了解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敢于突破传统，富于冒险和创新精神，涌现了许多开风气之先的仁人志士。容闳就是近代“聪明的珠海人”的代

2 珠海历史文化书系 总序

表，他较早地接触到西方近代文明，认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性，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起了带头和推动作用。从而使珠海地域文化在中国近代史上谱写了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篇章，孕育了容闳、陈芳、莫仕扬、苏曼殊、唐廷枢、徐润、蔡昌、唐国安、蔡绍基、唐绍仪等走向世界的先行者，以及苏兆征、林伟民、杨匏安等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思想家和工人运动领导人，还有古元、容国团、鲍国宝、特伟、鲍惠荪、吴思远、莫华伦等现代英才，他们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领域成就梦想，珠海也因而成为享誉中外的名人故里。

这些历史文化名人既是珠海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是整个岭南文化的一笔宝贵财富。因为，岭南文化的主要特点就是它的兼容并蓄，勇于开拓，大胆革新，求真务实。形象地说，岭南文化是一种“咸淡水交汇处”的文明，也就是所谓的“基围虾”特性，珠海恰恰就是体现了这种特点的典型地域代表。珠海是近代最早直接接触西方文明的地区。澳门开埠比香港早了300年左右。珠海地域文化矗立于两个扇面的交接点上：背靠着中华传统文化，沐浴着欧风美雨，承接着西风东渐，因而得以较早将西方的文化因子带入广东，对传统岭南文化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随着新的异质文化的融入，处于剧变的近代中国社会背景下的岭南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巨变，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适应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要求。通过全套丛书，我们不难从中发现近世珠海地域文化对岭南文化发展演进的重要历史性贡献。

同时，这套书系的出版，既是对珠海历史人文资源的一次挖掘整理，更是一次对珠海城市人文精神的弘扬和重塑，对弘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珠海经济特区精神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回溯历史使我们发现，珠海特区精神其实不是

突兀地形成的，而是有着十分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其个性稟赋上承六千年海洋文明史，下接波澜壮阔的近代历史——思潮大变局。海洋文明成为珠海“重商意识、冒险精神、开放心态、包容性格”的城市精神的最初源头。迄于近百余年，从容闳到杨匏安等一大批先行者冲破黑暗的牢笼，探索救国救民之路，都是敢为人先精神的生动体现。珠海人的开拓进取、敢闯敢冒的精神，以及开放、务实、合作、兼容的文化心态，既是特区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珠海历史积淀而成的人文精神传承。要之，它是中华民族精神、岭南文化传统和广东改革开放思想相融会的结晶，体现着一定地域和社会历史背景中形成的当代群体思想观念、性格特征和文化心理。在新的历史征程中，珠海经济特区要继续争当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排头兵，就必须大力弘扬这种深深植根于珠海历史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使之成为珠海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和文化基因。四套丛书的出版，就是其得力的形式和不寻常的举措。

显而易见，这套书系即四套丛书的编纂出版，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为其出版，珠海市委宣传部统筹规划，珠海市文联、珠海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会、珠海出版社认真抓好组织落实，珠海社会各界鼎力配合支持，他们既为珠海，也为岭南文化的深入研究和挖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我和从事岭南历史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们，对他们的远见卓识和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祝愿珠海历史文化研究取得新进展，祝愿珠海文化建设取得更大的成就！

（作者曾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和省社科联主席、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及广东孙中山研究会会长等职，著名历史学家）

“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丛书序

王 杰

欣悉珠海市组编“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丛书，感奋不已。早在1998年，珠海市人民政府主办了颇具国际影响的纪念容闳诞辰170周年“容闳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掀动了容闳及留美幼童研究的热潮。2004年11月，继之召开纪念容闳毕业于耶鲁大学150周年暨“容闳与科技兴国”学术研讨会，未久，即着手编辑此四套丛书（“珠海历史名人”丛书、“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丛书、“珠海历史名人著作”丛书、“珠海人文风物”丛书），动作之迅猛，立意之高远，策划之精到，实出人意表矣。

“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丛书的出版，学术及现实之立意诚谓深远：

一、容闳与留美幼童开拓了近代中国留学的先河

容闳被学界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他与留美幼童开近代中国留学先河的历史地位自不待言。近代以降，文明千年的华夏民族相对于工业革命后的西方列强而言，已凸显其封闭与落伍，鸦片战争的爆发，“强盗的”西方和“文明的”西方不仅打开了中国与世界隔绝的大门，还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球与思维，与之因应，不屈的中华民族和先进的中国人由此拉开了抗

击列强侵略和探求西学追求真理的宏大序幕。如果说林则徐为斯时“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话，那么，容闳可称得上是“开步学世界的第一人”了。自“以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后，容闳苦心孤诣，努力奔走了17年之久，最终促成清政府派遣幼童留美教育计划的实施。众所熟知，亦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容闳力促幼童留美之愿景（于就读大学期间经已形成）极富爱国、救国、强国之质涵——“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容闳言与行俱，不仅为史无前例的留学计划身体力行，还通过出色的社会活动，鼓励和带动桑梓人民持助出留，因为“在当时，到美国的旅程，好似天涯海角一样，而一般家长父母是不愿其子弟远行的”。有稽可查者，120名幼童广东籍计83人，约占69%（江苏22人，浙江8人，安徽4人，福建2人，山东1人）；粤童中香山籍计39人，约占全省的近一半，约占全国的1/3。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评价，诚如近代教育家舒新城所言：“无容闳，虽不能一定说中国无留学生，即有也不会如斯之早，而且派遣的方式也许是另一个样子。”君不见，容氏与留美幼童之筚路蓝缕艰辛开先，激励着往后的留欧、留日乃至留法热潮的掀起，危难之中华民族，涌起代代救国、强国精英。

二、容闳与留美幼童架起了中美文化交流的桥梁

文化桥梁是连接两地的，由此引发交流与互动，既不会因贫富之别而单向，亦不会因文明之异而排拒。不同质的文化同样可以汇通与共融。

关于容闳与留美幼童之“西学东渐”的功业料必无须赘言。他们对于“东学西渐”的早期努力，虽然是有限的、肤浅的，却是具开拓性的、不容忽略的。业师章开沅教授曾查阅过

耶鲁大学的容闳档案，发现容氏不仅对《四书》和若干中国史书、诗词有所了解，而且利用这些典籍中的名言佳句为 1854 级众多美国同学赠言。其后，他担任中国留学生副监督，在哈特福德工作 6 年之久，曾向耶鲁大学赠送《纲鉴易知录》、《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山海经》、《康熙字典》、《三国演义》、《李太白诗集》等书。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和极富内涵的历史人文精神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着西方人。从当年耶鲁大学校长朴德（Porte）为挽留幼童完成学业特函总理衙门的话语，诚可窥视一斑。函曰：“诸生言行之尽善尽美，实不愧为大国国民之代表，足为贵国荣誉也。盖诸生年虽幼稚，然已能知彼等在美国之一举一动，皆与祖国国家之名誉极有关系，故能谨言慎行，过于成人。学生既有此良好之行为，遂亦收良好之效果。美国少数无识之人，其平日对贵国之偏见，至此逐渐消灭。而美国国人对华之感情，已日趋于欢洽之地位。”及至后来，蔡廷干曾用英文撰写《唐诗英韵》（Chinese Poems in English Rhyme），1930 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他晚年所撰研究老子的著作《老解老》一书，在美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果我们把留美幼童的翻译邝其照纳入视野的话，他的巨著《英文成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English Phrases With Illustrate Sentences），1881 年于纽约出版，美国专家和名流欣然为之作序，至今仍为美国学人的参考书。东（中）学西渐，可谓微风入夜，润物无声。

三、容闳与留美幼童造就了一批强国栋材

容闳与留美幼童在中国近代史的地位与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容闳以一人带动一批，一批影响一代，一代造福一国的强大震撼力延续其宏愿。《湘报》（1898 年）曾评价容闳与留美幼童“所造就至今或充出使人员，或办交涉事件，老成硕画，

4 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丛书序

收效显然”，经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风云的洗礼，他们逐渐锤炼成清廷政、军、商、学界的知名人物，对中国向近代化迈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据李喜所教授统计，这批留美生中从事工矿、铁路、电报者 30 人，其中工矿负责人 9 人，工程师 6 人，铁路局长 3 人；从教者 5 人，其中大学校长 2 人；从事外交、行政总长 1 人，内阁总理 1 人；从商者 7 人；从海军者 20 人，其中将领 14 人。留美幼童最突出的贡献显现于工商业界，他们在工厂、矿山、铁路、航运、电报、电话、银行、商店等部门担任技术指导，不仅在各自的岗位上创造了科技成果，也在各新兴的行业中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工商界的佼佼者，当数詹天佑。1904 年当他率领随从勘测京张铁路时，外国人讥之为笑话，甚至嘲蔑说此路的工程师还未出世。詹氏顶着流言，力战艰难，攻克了最艰巨的打隧道和爬越八达岭工程。1909 年 8 月，“开车之日，王公庶士及东西人士观者数万，咸啧啧称为古所未有”。京张线比原计划提前两年竣工，省下白银 28 万两，比延外人修筑省费五分之四，建树惊世。尤为值得敬仰的是，幼童还在抗击外国侵略者中血染沙场，视死如归，以身殉国，深为国人痛惜。李鸿章对年仅 33 岁、在甲午中日黄海大战中殉难的陈金揆褒扬有加，上奏称誉他“争先猛进，死事最烈”。毋庸讳言，幼童的栋材之功正在于“他们对于商业及友好关系上，带给中国正确的方向和利益，他们促进中国的富强和进步，而使中国跻身于世界友邦之中”。

“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丛书的编辑，其史料与研究著述之策划可谓精到：

“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丛书第一批包括《中国幼童留美史》、《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我的中国童年》、《创办出洋局及官学生历史》、《容闳与中国近代化》、《容闳与科教兴

国——纪念容闳毕业于耶鲁大学 15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六种，前四种属史料性，后两种属研究性，两种相互映衬，浑然天成，从整体上展示史出有因、论出凭据之涵意。

《中国幼童留美史》（China's First Hundred）系美国华盛顿州立学院历史学教授勒法吉博士（Thomas E. la Fargue）所著，1942 年华盛顿州立学院出版。著者数度来华，于津、京、沪走访当年留美幼童之健在者，遍览中英文史籍，广征博引，使该书为研究中美文化交流及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重要著述。新中译本由高宗鲁先生在原书的基础上，增添一批未刊照片、手迹及信件，臻幼童留美资料至完备。

《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由美国“中国留美幼童研究会”会长高宗鲁先生编辑并中译加注。收录幼童的“书信”、“自述”与施肇基等纪念幼童留美的讲词以及“清朝幼童留美史实”、“留美幼童与甲午海战”两文，凡 49 篇。展示了幼童求学就业的艰辛历程、师友情感的内心轨迹、个人历练以及国家关注的感悟，是研究留美幼童与中外文化难得的原始资料。

《我的中国童年》为第二批留美幼童李恩富所撰，由其孙理查德·威·李编辑并撰评介。该书叙述了李恩富在故园的童年生活及风俗趣闻、负笈上海、踏足美国等内容，不失为《西学东渐记》之后一本关于留美幼童个案研究的重要史料。以小见大，具较高的参据价值。

《创办出洋局及官学生历史》系容闳的侄子、第二批留美幼童之一的容尚谦之作。1939 年，120 名幼童之健在者尚有 19 人，部分相聚沪上，提议回忆出洋局和留美事功，以昭后人。集《创办出洋局及官学生历史》、《容闳博士对中国近代化发展的影响》及其《自传》三文以成，叙述了容闳和黄宽的求学史，容闳的“教育计划”始末，幼童赴美幼学经历，以及其报国业绩，并对 103 名幼童作了简介。既见树木，又见森

6 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丛书序

林，予人以“全景式”的史料展示。

《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系1998年11月纪念容闳诞辰170周年“容闳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的论文结集。原版收文52篇，曾于1999年由珠海出版社出版。此次新编，除序言外共收文26篇，就容闳的历史地位、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思想及其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等内容展开述论。论文凸显了容闳与中国近代化主题，思想性、学术性与知识性兼具。

《容闳与科教兴国——纪念容闳毕业于耶鲁大学15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录了2004年11月在珠海市召开的同题的学术研讨会论文凡40篇，该结集的特色在于它不仅仅论及容闳，更扩展至与留美幼童相关的各个层面，拓宽了研究视野。文章多出自专家之手，对进一步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具有导向意义。

新史料的发掘和对研究前沿的把握，乃学术创新的前提，别无捷径可寻。“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丛书的面世，正为这一主题的创新研究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可以预期，丛书的刊行，必将对推动容闳与幼童、幼童与中外文化、幼童与中国近代化诸领域的创新研究，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北宋哲学家张载于《张子语录》中告诫后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如何承继和弘扬容闳与留美幼童的爱国、报国、强国的精神与品格，为科技兴国、和谐社会贡献绵力，当不仅是学人之修为，也是衮衮智者毕生之使命，庶几，方不负本丛书出版之初衷与宏愿。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史学博士）

容闳和中国近代留美教育的肇始

本书为作者 1939 年刊印的三篇英文文章的汇集，原无书名。三文贯穿一个中心思想，即容闳生平及其主要成就——开创近代中国留美教育的始末。作者是当年留美幼童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也是当时在世的 17 个留美幼童中的一个，写此文时已 ^{1862.}69 岁，仍执笔亲述往事，实数难得；而据今材料看，此文写作时间最晚，距现时最近，益显材料之全面、丰富和准确，弥足珍贵。相信此书面世，对于关心和研究中国近代留美教育之肇始不无裨益。

作者题献

纪念我挚爱的妻子余学玲和她的舅舅黄宽，以及我的叔叔容阔，谨将这份回忆奉献于尊前。

1872 年中国出洋局 120 名学生中，今日尚存者仅 17 人，平均年龄 80 岁。在一次“幼童”聚会上，大家谈到出洋局，提议由我写下我所能记起的关于出洋局和幼童们的事。确切地说，他们认为，把这些事记录下来，特别是记下对劳苦功高的容闳博士的纪念，趁这一主题和各主角尚在世而未全被遗忘之前，把信息留给我们的年轻一代，是我的责任。于是，我鼓起最大的勇气写成这篇回忆录。

“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丛书序	王 杰 1
再版说明	王敏若 1
作者题献	1
前 言	1
创办出洋局及官学生历史	1
出洋局创办人容闳博士	1
出洋局的诞生	7
出洋局的终结	13
中国出洋局的影响及其后续效果	17
中国出洋局留学生传略	19
容闳博士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35
运动是怎样兴起的	36
第二个中国出洋局	38

留学教育对中美友谊的促进	39
毕业赠言	42
容尚谦自传	44
<i>DEDICATION</i>	52
<i>PREFACE</i>	53
<i>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AND ITS INFLUENCE</i>	54
<i>DR. YUNG WING, THE ORIGINATOR OF THE MISSION</i>	54
<i>BIRTH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i>	63
<i>DEMISE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i>	72
<i>THE INFLUENCE AND AFTER-EFFECTS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i>	78
<i>BIOGRAPHICAL SKETCH OF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STUDENTS</i>	81
<i>THE INFLUENCE OF DR. YUNG WING ON CHINESE DEVELOPMENT</i>	107
<i>HOW THE MOVEMENT STARTED</i>	108
<i>AUTOBIOGRAPHY OF YUNG SHANG HIM</i>	119
译者的话	王敏若 131

创办出洋局及官学生历史

(此文曾发表于 1939 年 10 月《天下月刊》第 9 卷第 3 号上)

虽然中国出洋局存在的时间不长，按其既定要求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在推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却起着主要的作用。

出洋局出现于约 70 年前，存在时期也仅有短暂的 10 年，因此留下来的有关记录很少。它会被人们遗忘。但它自身所创造的事实，它的成员个人留给人们的印象，对那些能够为报效祖国而工作的人们的价值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出洋局创办人容闳博士

出洋局是曾去美国接受教育的容闳博士的新理念。容闳博士回归中国最大的心愿，是创立一个出洋机构，使中国学生能够出国留学，用外面的知识装备自己，树立一个广阔的国际视野，使之能在为祖国服务中担得起负责的岗位。

有人提出问题，容闳博士怎么会那么早就去美国呢？事情是这样的：容闳博士、黄宽医生和黄胜先生是最早离开中国、到外国去接受教育的三个中国人。

容闳博士早年的一些生活的情况，都有完好的记载。他

历史

进入一所由古兹拉夫夫人 (Mrs.Gutzlaff) 开办的、最初只收女生的学校。这时容闳 7 岁，是第一批被准许入校的两名男生中的一个。古兹拉夫夫人是哈里·派可斯 (Mr. Harry Parkes) 先生的姑姑，而派克斯先生则是跟随两个姐姐来到中国，帮助她们管理这所学校的。容闳博士就是在他们的指导下，念了一个短时期的书。哈里·派可斯先生随后参加了英国政府的公务工作，并受封“骑士”爵位。后来，古兹拉夫夫人的学校关闭了，容闳博士又回到自己的家中。1839 年玛礼孙书院在澳门开办。1841 年容闳博士进入这所书院念书，在他之前已经有了 5 个男孩入学，他们是他们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1840 年鸦片战争后，香港割让给英国，玛礼孙书院于 1842 年迁往香港。书院被一个叫玛礼孙教育会的机构所接管，该教育会的宗旨是要在中国推行英国式教育。它之所以取名玛礼孙，是为了表示对 1807 年由伦敦教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位传教士的景仰。这个书院完全仰仗过路洋商的资助，之所以称为“过路”，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哪个洋商愿意在中国度过他的一生。

在玛礼孙书院，有一位从美国来的罗伯特·布朗博士 (Dr. Robert Brown) 在任教。1846 年布朗博士由于健康不佳离开中国，但出于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他在离中国前宣布，愿带几个老学生和他一起去美国。容博士、黄宽医生和黄胜先生表示愿意去。他们的经费由布朗博士和玛礼孙教育会给予安排。但资助人不希望他们在美国留学时间超过两年。抵

达美国后不久，黄胜先生由于健康不佳只身返回中国，留下容闳博士和黄宽医生继续他们的学业。

笔者非常荣幸，在 70 年代初，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巴勒特（Barletts in Hartford, Conn.）家中，和布朗博士见过面，这是一位有恩于容氏家族和黄氏家族的大恩人。他专程从新泽西州澳兰治城（Orange, New Jersey）前来看望他辛勤劳动的成果——“容闳博士的幼童”。布朗博士身材高大，体态匀称。我见到他时，他身体微弯，表情凝重，内心蕴藏着雄厚的实力，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凡是有机会和他接触的人，无不由衷地对他产生敬意。这就是当时作为一个孩童的我，对布朗博士的印象。

在这些仁慈的资助者中，很少有人能够从他们狂热的梦想中想象到，他们的慷慨资助后来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而如果没有他们的经济援助，容闳博士和黄宽医生根本不可能到美国去接受教育。两年期满，黄宽医生转到苏格兰的爱丁堡去学医，而容闳博士则进入耶鲁大学。此时，原资助人的经济援助已经停止，容闳只能尽其所能在学校里靠打工维生。正在这个节骨眼，布朗博士又一次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向佐治亚州萨凡纳的一个妇女会（Ladies' Society in Savannah, Georgia）介绍了容闳博士的情况，从而替他申请到妇女会的经济援助。在苏格兰，黄宽医生进入了爱丁堡大学，在那里待了 7 年，于 1857 年返回中国。他毕业时享有很高的声誉，在他的医学班上名列第三。他成为一名优秀的专家，具有天生的医学禀性，在专业上出类拔萃。他的能力和

历史

医术的高超，使他享誉远东，被认为是那个时期地中海以东最伟大的外科医生之一。1879年他在广州去世。他的去世，对所有的社团，无论中国的或外国的，都是一个重大损失。他以自己的品格、率真和纯正的一生，赢得人们高度的崇敬。

容闳博士从耶鲁1854级毕业，获学士学位；以后又获得母校赠予的法学博士学位。他一毕业就返回中国。他在校时，因连续两年获得英文作文一等奖而享有盛誉。母校赠予他的法学博士学位，是母校第一次给予中国人的，也是第一次给予外国留学生的。

容闳博士从耶鲁毕业起，他一生的宏愿就是促成中国留洋局成立，派遣一些学生出洋留学，学成后为祖国服务，以迎接千变万化的世界形势。但是，在1870年前，也就是天津惨案（指天津教案——译者）前，他的计划没有实行的机会。此次惨案源于那时群众的极度无知和迷信，他们误解了修女们在她们的医院里和孤儿院里——在法国的保护下——所做的善事。他们相信了外间的传闻，说天主教堂把残疾儿童收集起来，挖掉他们的眼睛，供医疗和宗教方面使用。这些传闻甚至远播广州（我还是小孩时就听说过）。在天津，传闻像燎原大火一样蔓延，人们失去了理智，群众捣毁了一座圣公会、一座教堂和罗马天主教堂、医院和孤儿院，有些修女被杀害。此时法国正处在普法战争的边缘，事件很快得到处理，处理条款包括重新修建所有被毁坏了的建筑物和财物，向所有受害者的亲属赔款，并正式道歉。

为处理这一丑事，国内一些高官被召集到天津：他们是

两江总督曾国藩、茂崇熙、刘昆一和江苏巡抚丁日昌。丁日昌也是容闳博士的好朋友。容闳博士也被召来参加会议。

事件处理完毕，官员们即将陆续返回各自的总督、巡抚岗位，容闳博士抓住机会，呈上自己的四点计划，请他们考虑。计划如下：首先，组建一只汽轮船航运队，运送长江下游省份按一定比例承担的年度漕粮进京，以取代税金。此前是用驳船驶经大运河，把漕粮运到上海、浙江，再用帆船把漕粮运抵天津，然后再换船运往北京。这种运输方式会因天气、盗窃、粮食发霉等原因，造成重大损失，常常要慢好几个月才能把货物运达目的地。

其次，容博士建议，政府应当选拔 120 名学生，派遣他们去海外留学 15 年，接受全面教育，为国效力。每次派出 30 人，如果证明成功，可以一直继续派下去。随同他们去的有中文教师，以保持他们的中文学习，另有两位监督，负责对他们的管理。他们的留学经费和出洋局办公的花销，由上海海关道台集资提供。

第三，还建议政府开采国有煤炭资源，修建用于运输煤矿的焦煤及其产品的铁路。

在第四项建议中，容博士指出，外国势力有侵占中国主权的习性，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会逃避惩罚。在拿破仑·波拿巴时代，法国和教皇曾经达成过“协议”，由法国每年给教皇 1000 万法郎的补偿金和其他一些东西，以换取法国在世界各地保护罗马天主教教徒的权利。有了这一强权的支撑，在中国的罗马天主教会毫不迟疑地攫取了对教徒进行控制的图

历史

谋和权力，宣称拥有对他们的教徒的司法权，使教徒的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审判脱离中国法庭。得知这一情况后，其他宗教教会也都毫不迟疑地跟上。因此容博士建议，中国应当明令禁止所有宗教教会对他们的教徒行使任何民法和刑法的司法权。

中国出洋局的计划，在上述各项建议中被列为第二位，是有意让它不那么突显，其实其他三项完全是陪衬的。这正是那个时代的公文格式的要求。这四位大臣在容闳博士的建议书上签了名，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并以奏折形式，呈报政府，建议采纳。

1870年，曾国藩总督收到皇帝的敕文，批准关于容闳博士四点建议的联合奏折。容博士接到通知后，立即赶往南京，和总督商讨计划的执行问题。

就这样，从天津惨案的灰烬中，诞生了中国留洋局，这是容闳博士的创意成果，是轮船计划的孪生姊妹。一家名为“中国轮船航运招商局”的轮船公司正式成立，它拥有船只、码头、仓库和一般轮船公司的所有主件。政府为了支持这一机构，批准公司拥有30%的股份，其余70%的股份由公司向中国公众出售。作为起点，收购了一家航行于长江和沿海的、拥有少量船只的美国轮船公司的轮船和其他财产，使得中国轮船航运招商局很快成为一家羽毛丰满的、可以运行的企业。

依照公司章程，中国政府有权任命一位总办，这纯粹是个挂名的职务；此外，公司还将按照别的股份公司那样运作。由于容闳博士不可能同时照管这两份事业，于是推荐他的一

位朋友，也是他的玛礼孙书院的小同学唐景升（即唐廷枢——译者注）先生，负责中国轮船航运招商局工作。这项推荐被批准，唐先生管理这家公司多年，取得很大成功。他后来又被派到唐山，负责唐山煤矿工作，该煤矿现在名为开滦煤矿和工程公司。

出洋局的诞生

陈兰彬，一位属于保守派和政党的老式学者，和容闳博士一起被任命为出洋局的联合监督。陈兰彬的责任是负责学生坚持中国知识的学习，容闳博士的责任是负责照料学生接受外国教育。这两方面经费都照顾到。另派两名教师和一名翻译，充实到出洋局的理事会中。

1871年，一所可以容纳 100 名学生和教职员的学校在上海开办。它坐落在老英国坟场对面的山东路上，即今天南京路后面一条路上。教职员包括刘开升校长，吴子石助理，三位中文教师：容先生、陈先生和黄先生，还有一位英文教师曾来顺，他带了他的两个儿子曾子睦和曾子安来协助他。入学要通过考试，候选人选自良家子弟。所有教育花销均由政府支付，但家长或监护人要和政府签约，承诺学生出洋留学期间，无论出现何种情况，如死亡、病痛或伤残，政府概不负责，不承担任何义务。按照容闳博士的计划，在四年时间里，要从这所学校招募 120 名学生出洋。

每年派遣一批 30 人去美国，学习 15 年，包括毕业后的进修和去欧洲一些国家考察。

历史

1872年夏天，举行第一次招考，被录取的学生立即由陈兰彬率领，派去美国，中文教师叶树栋和容元富，还有一位翻译曾来顺陪同。容闳博士比别人提前一个月赴美，联系一些家庭准备接纳和安置留学生，务使这些学生来到美国，开始投入完全不同于祖国文化的新生活时，会受到很好的照顾。笔者还记得当初乘坐木制轮桨船横跨太平洋的情景。有奶牛和羊只一块带上船来，准备为餐桌提供新鲜的牛奶和肉食。遇到狂风暴雨的天气时，船身吱吱作响，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出现一副令人惊恐的景象。在跨越大陆的旅程中，还见到大批野生水牛在草原上奔跑，未开化的印第安人骑在没有鞍的马背上，用弓箭追猎和射杀它们。

我们先到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斐尔德（Springfield, Massachusetts），被安置在中国出洋局总部，后来又迁往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的森那大街（Sumner Street, Hartford, Connecticut），直到出洋局在柯林斯大街（Collins Street）建起了自己的大楼。这座华丽而新颖的建筑，连同它的地下室，却被孩子们起了个诨名“地狱之家”，因为他们必须在学校或学院放假的日子里，来到这里学中文，为他们所犯的过失或懈怠受斥责，而批评和指责是不容申辩的。

1873年夏天，第二批学生30名，在容元甫带领下出洋。在从旧金山到斯普林斐尔德的路途中，经过当时粗犷而荒凉的美国西部时，他们有幸遇到那时大名鼎鼎的火车劫匪杰西·詹姆斯（Jesse James）的光临。他们乘坐的是最后一节车厢，其他两节车厢都出轨了，翻倒了，他们却安然无恙。

第三批、第四批分别于 1874、1875 年派遣。是在英文教师、《中英字典》的署名作者邝其照和中文教师容汉三、刘云舫的带领下。

后来陈兰彬被任命为中国首任驻美特命全权大使，在离局赴任时，欧岳良由政府派来继任。中文教师三人是容元富、刘云舫和容汉三。

1873 年，容闳博士回中国，是为政府购买军事装备有关。在中国期间，他帮助结束了古巴、秘鲁那桩丑恶的、可怕的苦力交易活动。这些中国苦力在古巴、秘鲁的种植园和矿场做工，受到极端残酷的剥削，实际上是奴隶般的待遇。一名秘鲁政府代表来到中国，试图通过谈判，让中国正式批准一桩不人道的交易。容闳博士经过努力，并运用自己的影响，制止了这名代表的见不得人的企图，终止了这桩交易。

这里可以进行一番回溯。那时苦力交易活动的中心在曾经属于葡萄牙统治的澳门。早在明朝时，政府以每年 500 两银子的微薄租金，将澳门租给葡萄牙，用作贸易据点，以回报葡萄牙政府对打击海盗所给予的协助。

这笔租金一直交付到 1854 年，后来因澳门的葡萄牙总督被中国人杀死，葡萄牙拒绝支付。直到那时，它的面积还是非常小，长度仅 1 哩左右，边界用栅栏拦着。到了 1854 年，栅栏移到半岛的砂颈，就这样维持下来，边界问题处于未决状态。1885 年从栅栏的顶端起，划一条伸向横琴岛的线，这才把澳门的面积明确地确定下来。这一处理是由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爵士 (Sir Robert Hart) 在澳门内港拉帕岛 (Island

历

史

of Lappa) (即马留洲岛) 设关时, 为收回海关权力而给予的回报, 是他在 1884 年和法国最终商定关于东京湾 (即广州湾, 今名湛江——译者注) 的中法贸易协定时做出的。

那时, 西班牙、葡萄牙、秘鲁和古巴等国籍的商人和代理人, 正聚集在澳门, 招募中国劳工去秘鲁和古巴的银矿、硝酸矿以及种植园做工。这些商人用雇佣的方法, 把苦力控制在他们的手中, 手段非常恶劣。一种办法是将他们绑架, 剥夺其自由; 另一种则是怂恿他们拿自己的自由去赌博, 有商人在那里出资或担保他们去赌, 一旦输钱或欠债, 就陷入了和商人签订的永远失去自由的卖身契中。

这些人被集中起来, 关在澳门一座大型建筑里, 即尽人皆知的“猪仔馆”。一旦进到里面, 绝无逃出的可能。他们被监禁起来, 直到出航那一天。笔者在孩童时, 常去看这些苦力从猪仔馆走向海港内侧码头登船的情景。在那时候, 这样一支行列的出现, 是一起引人注目的事件。

这些人, 以后能够返回家园的, 如果有, 也是极少。在登船的路上, 他们穿着俗丽的衣服, 背着充实的背包。其实这些像样的衣服和背包, 全是做给旁观者看的, 以便留下一个好印象, 仿佛这些苦力缔结了一桩多么好的买卖; 登上船后, 这些东西统统被收回, 留待下一批使用。这些人离开中国时, 所有的只不过是身上穿的衣服而已。

这些苦力按照契约规定, 在一定年限内完全受顾主驱使劳动。在期满之前, 给他们造了许多谣言, 到处传播。到期后, 新顾主来了, 由于不了解他们, 不满意他们, 也拒绝释

放或遣返他们回国，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地沦落为奴隶，永远不得脱身。第一个顾主在接洽时，拒绝承诺他们任何权利，然后把他们转交给新顾主。新顾主在接洽时，反问他们，我又不是你的主人或顾主，你为什么要来找我？并且吵着说，如果他们愿意承认他们是他们的顾主，就必须表明他们是他的奴仆，也就是心甘情愿地为他干活。他们要么选择干，要么选择挨饿，结果只能在那儿干，一直干到死，到时又有新人前来取代他们了，这些人也面临着同样可怕的命运。

这些流氓、恶棍，把苦力们控制在自己手中，残暴凶狠到了极点。即使这些苦力死掉，他们的骨头也得拿到与甘蔗种植园有联系的糖厂里派用场。笔者一直关注着如何使这不人道的苦力交易停止，使那许多同乡同伴们的不幸和苦难能够得到解脱，而这正是容闳博士为他的祖国和同胞服务的伟大举措中的一件。

容闳博士后来被派往秘鲁，陈兰彬被派往古巴，进行实地考察，写出苦力们在这些国家的状况的报告。政府接到这些报告后，任命容闳博士为派驻华盛顿同时兼管西班牙和秘鲁的公使，照料在这些国家的中国人的利益。这时是1875年。

在接到这项消息后，容闳博士高兴和庆幸不起来，因为他满怀忧虑，怕把出洋局这一创新成果转交到别人手中。于是他给政府写信，一方面感谢对他的信任，另一方面请求免除这项任命，以使他能够把自己的全部心力贡献给出洋局。政府回复说，考虑到他的意愿，可任命他为副公使，同时保



留他在出洋局的职位。

容闳博士对出洋局转手他人的焦虑，终因出洋局走到尽头而被证实。他的时间全都被与上述三国的外交事务所占用，被管理组建几个领事机构所需工作人员的事务所占用。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与别的国家建立领事关系，可以说，容闳博士是中国领事事务的真正创始人。

欧岳良退休后，吴子登成为继任者。那时还不知道此人是一个心胸狭窄而又无头脑的保守派。他办起事来像个疯子，当即给朝廷写了一系列充满谎言的报告，着手毁掉这个出洋局。他声称这些孩子全部美国化了、无国化了，如果让他们继续完成在美国的学业，对中国没有一点好处，只有害处，而容闳博士则站在他们一边，偏袒他们。没有比这样的谎言和造谣更无耻的了。事实上容闳博士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训练者，够得上打训练大师的分。各个学校都定期有报告送给他，他有一套衡量的标准，如果某项工作连续两个月没有达到指标，这个学生就会被叫来受到严厉地惩戒。第一次犯规犹有可原，如以后仍无改进，再下去就是浪费政府的钱财，这个犯规者就得打道回府。

容闳博士听到这样的谰言和谎言后，他给政府写报告，告以真实情况。但没有起作用，因为吴子登的报告已经做在前面了。结果是出洋局停办。

吴子登憎恨出洋局的主要原因，是出于对容闳博士的嫉妒。后者既享有三个国家外交使团的肥缺，又保留着出洋局的位置。

在蓄意破坏出洋局的时候，吴子登向政府中的保守势力曲意逢迎，以图得到高额奖赏。他这一打算落了空，因为他回国后再也没有人听到他的消息了。虽然他对出洋局和留学生的不友好的态度已是众所周知，但他出于疯狂和嫉妒所施的诡计，使他那份报告中的虚伪和谎言在一段时期内未被人察觉。

出洋局的终结

1881年的夏天，当出洋局被解散和关闭，所有的孩子被遣返回国的命令到达时，真不啻晴天霹雳。他们刚好完成学期的学业，正在康州巴塘湖 (Bamtuam Lake, Conn.) 畔举行大型露营活动，欢度暑假。这时容闳博士来到他们中间，带来令人目瞪口呆的关闭出洋局的消息。他们非常伤心，心情十分沉重。露营也关闭了。孩子们纷纷回到各自的家中，打行李装，准备回国。中国出洋局存在了整整9年，终于走到了尽头。

容闳博士的孩子们被分成三组，在三星期内陆续离开美国。回国后，按照先来后到，被派往各自的目的地，去陆军、海军、兵工厂、政府的面粉厂和矿山、医校、税务局、自来水厂、海关、电报局和其他政府部门。从此以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互相再也没有见过面。

当然也有例外，以下两件事就是：笔者有一次在山东一个小城镇候车，为了消磨时间，到市场上漫步。忽然间看见一个人，就向他喊道：“喂，大业小子！”回答说：“喂，容

历

史

良！”“你怎么在这儿？”“等车。”“去哪儿？”“去吉卡（外蒙古的满洲里）（今为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下同——译者注），你呢？”“也在等车，回广州。”我们有30年未见了，以后也再未见面。

另一件事是这样的。我来到京奉铁路一个小站，在站台上等候邮车。突然看见一人从小车里伸出脚来，迈出车门，向我喊道：“喂！詹尼·良。我有25年没见到你了。”他是祁祖彝。我问他：“你从哪儿来，打算到哪儿去？”“从成都来，到奉天和安东（与朝鲜为界）（即今丹东——译者注）去，到那里去当道台。来，聊一聊。”于是我随他去了200哩以外的山海关。当晚在旅馆住下，聊了个通宵。次日黎明分了手。他向东去，我向西去，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随着第一批学生从美国归来，出洋局的关闭以及关闭的原因，当然已为公众所知晓。所有的肮脏和丑恶的谎言、捏造和诽谤都抖搂到了公众面前，我们这些人都被认为或被看做是无国化的人，并且受到这样的对待。我们登陆后，在士兵的监视下，列队走进被土墙围着的上海城，被赶进一座长久废弃的学校建筑里。每人发给两块光木板子，没有褥子，还有一条肮脏的棉被，发霉、发潮、发臭，一里外都能嗅到。一队士兵把守在各个门口，防止我们走出去和朋友或家庭取得联系。胥官小吏，身着官服，自始至终用粗暴的和轻蔑的态度对待我们。我们那时都身着西装，因为手中没有一分钱，无法去买衣服把它换下来。整群人中连一个铜板都没有。我们被人看做是野蛮人，受到野蛮人的待遇，这一点可从以下

事见之。

给我们吃的食物简直可怕，连猪食都不如，我们只好抓住负责给养的人，因为听说他从我们的伙食标准中打了 50% 的折扣归了自己，而厨子又从余额中扣了 50% 折扣归自己。这样我们一天只得到 25% 即 5 分钱来买食物和炊事燃料。当他听到我们的抱怨并要求改善生活时，他把厨子叫来，当着我们面说：“这伙人抱怨伙食不好，你去给他们多加一点盐，就得这样对付他们。”

我们实质上都成了令人讨厌的囚犯，而且使人感到确是如此——这是失败的代价。过了一段时间，其中有些有势力的获得朋友和家庭的保释，那些没有势力的，也允许外出寻找必要的保证。容闳博士的一位朋友，徐雨滋（即徐润——译者注）先生，中国轮船招商局经理，了解到我们的经济情况，答应借给每个孩子 30 美元，去替换身上服装、购买床上的用品，等等。当这个大组被分解为不同的小组，分派新的工作，去到新的地方，分别时都很伤心。

在往后的年月里，当我们为自己在事业上取得的微不足道的成功而感到欣慰时，我们很少去谈起早年奋斗的艰辛。这是我们之间极力避免谈及的话题，因为回忆起来实在太痛苦了。一定要我们谈到人生的升降沉浮，和必须吞下的屈辱的蛋糕时，从不在第三者面前道及。一个人的经验足以代表全体。

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大学奖章获得者以及所有的人，回国以后，无论干什么工作，每月得到的只是 4 两银子（5.5